

欧洲大学与城市互动的历史变迁

●何文栋

摘要 纵观大学与城市关系的演进史,可以说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史就是一部冲突与整合并存的历史。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子在大学与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发挥作用的差异,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样态:中世纪时期,大学与城市之间的依生性与冲突性并存,并且冲突性居于主导,15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大学与城市“彼此疏离”,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进入“接轨结合”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末的大学与城市走向全方位互动,21世纪以来的大学与城市互动发展走向集群化、联盟化。

关键词 欧洲大学;城市;历史变迁

作者 何文栋,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大连 116024)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大学或城市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的大学或城市是不同时空背景下人类文明的结晶,因而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是恒定不变的常数,而是随着时空的转换而不断变化。从欧洲范围内看,大学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变化,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

一、中世纪时期的大学与城市

大学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尚处于农业文明阶段,农业经济居于社会中心,城市也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欧洲的中世纪,城市主要是社会的宗教中心、政治中心或军事中心,而非典型的社会经济中心,城市的工商业是后来的产物。

从地缘关系看,中世纪大学具有某种天然的“依生性”,据史料记载,博洛尼亚大学所坐落的博

洛尼亚得益于其地理位置的先天优势而成为著名城市,正如有学者所言:“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北部天然的十字路口和主要干道汇合地。……因为有相当多的人员来往,使它成为一座著名城市”^[1]。正是这些往来的人员推动了早期大学的诞生、成长和发展。中世纪大学与城市的地缘关系是昭然的,“像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布拉格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均以‘地名+大学’的方式命名”^[2],确切地说是“城市或城镇名+大学”。中世纪大学与城市虽地缘关系紧密,但大学的“小城镇倾向”也是非常典型的,德国就是小城镇建大学的典范,像海德堡、弗赖堡等都建在小城镇而非大城市。中世纪时期的大学与教会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被誉为“居住僧侣的村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意味着大学是社会

本文系2016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学与城市互动研究”(编号L11WTA001)的研究成果。

的孤岛。历史显示,中世纪的大学与城市存在特殊的关系,主要表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大学与城市市民的“依生”与冲突

大学依托或寄居城市而生存和发展。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与城市的兴起相关,诞生后的大学生长于城市,城市成为大学生存与发展的直接环境,为大学提供各种物质条件。中世纪早期的大学没有固定的教学和居住场所,大学依托所在的城市,租用市民的房屋。与乡村不同,大学不直接生产物质资料,不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而城市不仅是可以为当时的大学提供安全、稳定、并不昂贵的房子及食物的唯一可能场所,而且是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教学的人汇聚到一处的最佳场所。城市是大学的衣食之源和栖居之所,大学对城市存在典型的“依生性”。这种天然亲近的共栖,为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发展提供了机会、条件和可能。

大学与市民之间矛盾和冲突具有普遍性。中世纪的市民不同于城外人或乡村人,他们作为城市的一种特权阶级,对其他的一切邻人采取不友好甚至敌对的态度,经常以排他的方式来捍卫特权。大学的师生有自己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这与市民存在一定的差异,大学融入城市后,两者之间便存在各种矛盾和冲突。大学与城市市民最初是對抗性的,学生与酒馆老板之间的冲突、学生与市民因房租问题引起的争执等,经常成为市民与学生之间发生各种暴力事件的导火索。

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和干预使大学与市民之间的矛盾升级。中世纪时期教会和国王为了巩固政权而拉拢大学为其服务,授予大学各种特权,市民的权利无形中受到削弱,权利的天平失衡。市民虽然生活在自己的城市中却如同被征服者,而大学在国王和教皇的“庇护”和“偏爱”下,俨然成为城市社会中的“国中之国”。如,“13世纪末的巴黎城被描绘成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是以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为主的大城;二是以宫廷周围的贵族和大教堂为主的旧城;三是以大学生和教员们为主的大学。”^[3]市民为了重新从大学手里夺回本该属于他们的自治权,曾多次向国王请愿,结果却遭到了国

王的无情驳回和镇压,这使大学与市民的矛盾达到顶点,两者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二) 大学与城市当局的控制与反控制

中世纪大学作为一种自治性机构而存在。从空间上看,中世纪大学身处城市之中,但不从属于或归属于所在城市,像早期的牛津、剑桥大学甚至成为所在城市中法权乃至行政权的绝对权威者。

利益是大学与城市当局进行各自行为决策的重要动因。中世纪大学在国王和教会的庇护下成为城市中的特权机构,城市当局对大学的干预有限。城市当局为了控制和利用大学也给其一定支持。当大学在城市当局可控制的范围内且不过分侵害城市当局的利益时,两者和谐相处,一旦大学超出了城市当局可控的范围或城市当局触犯了大学利益,两者则“兵刃相见”。但是“腥风血雨”过后,城市当局为了城市发展常以赋予特权的方式,使大学与城市当局重新回到“和谐”的轨道上。从表面上看,大学与城市当局理应相互依存,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更多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国王和教会是大学与城市当局进行控制与反控制的助推力。大学对城市当局的控制与反抗,主要源于国王和教会的支持,尤其是赋予大学的各种特权,成为大学反抗和控制城市的重要手段。中世纪时期牛津大学与牛津城的“圣学者日战斗”事件,在国王的干预和协调下,最终以牛津大学获得对牛津城的控制和管理权而结束,牛津大学与牛津城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被确立,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牛津城是一个被牛津大学控制的城市。

冲突虽源于事物之间的相互抵触,但也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源。就像有学者所言:“当事物之间发生冲突时,冲突本身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解决要求,这就促使事物发生变化,以克服、解决这种冲突。”^[4]事实证明,“迁徙”成为大学制裁和反抗城市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因为“大学没有固定的建筑和地产,只是师生组成的社团或者协会,早期的大学流动性极强,故大学常以停办或迁址的方式与城市进行交涉并且迫使城市当局做出让步。”^[5]大学的

这种流动性, 造成了一种“跑得了和尚也跑得了庙”的格局。如, 1229 年, 巴黎大学的学生因住房问题与房东争吵, 并且在争吵中学生受了伤, 第二天学生对房东进行报复, 巴黎主教对此事件提起了诉讼, 致使巴黎大学的学生被抓捕, 抓捕行为引起师生罢课, 学校迁移至牛津、剑桥等其他城市, 最终巴黎大学关闭。一直到 1231 年, 国王圣路易 (Saint Louis) 赋予巴黎大学各种特权并承认其独立, 从此, 巴黎大学才开始摆脱被城市当局管控的命运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存在。^[6]

综上所述, 中世纪的大学与市民、城市当局的互动是畸形的, 冲突性的互动并非出于双方的本意, 但大学与城市双方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又不得已而为之。大学与市民的互动,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但这只是大学与城市政治性互动的“附属品”。

二、15 世纪到 19 世纪中期的大学与城市

(一) 大学与城市彼此独立却植根于国家的需要 (15 至 18 世纪中期)

15—17 世纪, 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和发现新大陆, 不仅扩展了欧洲人的航海事业, 而且加速了西欧迈向近代化的步伐。15 世纪末, 哥伦布发现美洲, 扩大了欧洲通向世界的新航线, 西欧的封建庄园经济开始逐渐被商业资本主义取代, 新经济体系的建立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诉求。

文艺复兴运动通过人文主义的传播为欧洲近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 16 世纪开始, 人文主义思想开始向教育领域蔓延,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 神性逐渐被理性取代, 神学不再是主宰欧洲大学发展的唯一因素。随后的宗教改革运动通过血与火的战争, 催生出近代民族国家, 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民族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幼芽, 大学开始演变为具有“民族属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作用下, 大学在教学、课程设置以及指导思想方面开始朝着民族化、多样化和人文化的方向发展。

17 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 并没有撼动欧洲传统大学的根基, 也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大学, 却催

生了一大批像技术学院、专门学院等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殖民扩张, 致使大量移民涌入城市, 城市人口激增进入扩张期。16 世纪见证了欧洲城市的复苏, 但从 17 世纪开始, 城市扩张的趋势减缓, 民族国家之间的纠纷和战争, 宗教各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以及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持续冲击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人口出现了衰退现象, 这一现象基本上持续了整个 17 世纪。从整体来看, 这一时期欧洲城市基本处于动荡、衰退时期。虽然社会变迁对大学提出了新要求并使大学在课程内容、培养目标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但这些要求和变化并非服务于城市发展需要, 而是植根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一时期的大学与城市之间并未产生实质性的互动, 大学的学科设置、责任和使命等, 与城市没有多大关联。

(二) 大学与城市“淡泊疏离”并未产生实质的“交集”

18 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 在其影响下欧洲其他国家, 像法国、德国等也相继开启工业革命的道路, 尽管不同国家开展工业革命的进程和步伐不一致, 但最终均掀起了城市化的浪潮, 并催生了一批新型工业城市, 如“在英格兰米德兰地区斯塔福德郡南部的煤、铁矿区就诞生了 7 个新的工业城市, 在苏格兰拉纳克郡的格拉斯福德地区形成了 3 个工业城市。”^[7]但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工匠在实践和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试错完成的, 大学对工业革命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一时期大学与新型城市之间并未产生亲密互动。正如学者所言, “早期的工业化无需大量的技术和科学, 教育与工业化并无直接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 技术人员的成长主要依靠个人的摸索和自身经验的积累, 熟练工人的培养主要依靠个人之间、师徒之间的技能和知识的传递。故工业革命并没有向教育提出特别的要求。”^[8]可以说, 这一阶段的大学与城市“彼此疏离”, 两者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交集”。

三、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的大学与城市

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 欧洲大学与城市的互动由“彼此疏离”进入“接轨结合”阶段, 尤其是在

工业方面“接轨结合”。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欧洲大学与城市在需求供给方面产生“结合点”，新型工业城市的发展急需大学提供的各类专业人才，而大学也需要在城市发展中拓展发展机会，大学与城市的良性互动的征程由此开启。

大学是催生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同，大学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源头且为其提供不竭动力。德国教育家洪堡的大学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创办，使科研成为大学的职能之一，欧美等国的诸多高校纷纷效仿其办学模式或改革原有大学。在这股浪潮的影响下，各种科研成果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并通过实践转化成各项实用技术，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大型工业城市、国家贸易中心迅速扩大。伴随着新兴工业城市数量的急剧增加，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加速了各国的城市化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打破了英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出现了欧美多国百花齐放的新格局，资本主义世界真正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要求高等教育为其培养能够掌握各种技术的专业人才，尤其是威斯康星大学使“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第三职能后，各国政府开始将高等教育纳入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轨道中，以期为国家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发展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这也是此阶段各国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

大学成为城市工业社会的中心。为了满足城市社会发展对技术和人才的各种需求，各工业国家大都创办了一批技术院校和工科学院。如，英国的一些地方城市开始创办以发展工业和科学为目的的城市大学，而且学校主要分布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在其课程设置方面，不仅有职业性质而且地方色彩浓厚，这些大学创办的主要目的是推动所在地方城市工商业发展，而且大多成为所在城市的工业研究中心。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和推动下，一向以传统著称的伦敦大学也开始强调加强与地方工商业的联系，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传统大学在这种社会背景影响下主动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的洗礼，科学技术取代宗教神学成为人们更为信奉的对象。“20

世纪之前，虽然有许多潜在的变化，（传统）大学仍然属于有钱的绅士和培养绅士，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学成为近现代工业和社会的中心发电站，而不再是培养年轻绅士的机构。”^[9]

除英国以外，德国、法国等欧洲其他国家，城市或新型工业城市在工业化的浪潮中为了满足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需要，还新建了一些工科大学和专门学院，以适应城市化发展需求。工业化推动了一批新型工业化城市 and 高等教育机构的诞生，工业化带来的资本积累为建设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物质支持。与此同时，这些新生的大学或者其他类型的高校，也通过为城市提供各种专业人才，推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四、二战后至20世纪末的大学与城市

20世纪上半叶，一些欧洲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而穷兵黩武，两次世界大战使大学在内的所有社会部门或机构都卷入了战争漩涡，大学建设因战争而减缓或停滞，大量校舍和设施被占领或摧毁。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也使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各参战国的城市建设几乎完全停止。

战后，欧洲各国对包括大学与城市在内的各方面进行快速恢复和重建。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以工业起家的传统工业城市开始出现传统制造业萎缩、就业和种族等社会问题，成为后工业时代老工业城市的“城市病”。与此同时，二战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由精英型快速迈向大众化阶段，大学的高速发展也引发了一些城市问题，城市危机爆发。为了扭转城市危机，欧洲各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活动，通过国家、城市当局和大学的共同努力，城市中心区的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传统工业城市获得新生的关键在于向以高科技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后工业城市转变，而高等教育是实现这种转变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欧洲各国开始充分认识到大学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尤其是大学的科研和社会服务在国家生存危机和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战后各国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时，更加注重引导大学发挥其参与社会问题解决

的社会服务职能。二战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为了迎接新世界的挑战,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以大学、科研、高技术生产为中心的“智力密集区”,如,英国的剑桥科学园、德国的慕尼黑城等。这不仅提升了城市的科技开发能力,促进了传统城市向后工业城市转变,而且加强了大学与城市之间的科技互动。

二战后,大学与城市互动发展随着大学社会职能的深化而进入全方位的“匹配相生”阶段,大学与城市之间的互动不仅仅体现在科技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也是昭然的。尽管这种互动在不同的欧洲国家有所差异,但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发展走向全方位是客观事实,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五、21 世纪以来的大学与城市

为了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竞争,抗衡北美、亚洲以及大洋洲的高等教育体系,增强欧洲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尽早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实现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格局,20 世纪 90 年代末,欧盟推出了促进欧洲学者、学生内部流动以及高校教学和科研合作的相关项目,特别是欧洲 29 国签订的《博洛尼亚宣言》,该宣言的签署为欧洲区域范围内高校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促成该区域内高等教育的核心力量整合,同时,也为欧洲各国之间进行跨国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种新模式。

欧洲区域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共同体和科研共同体彼此之间相互协作,共塑欧洲共识,推动欧洲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发展。欧洲国家在城市化与郊区化的对流和置换中,城市中心地带形成了以服务性、商业性和管理性为主的新的组织结构——大都市区组织结构。如,法国的巴黎——鲁昂——勒阿弗尔大都市区,英国的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大都市区等,大都市区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在各种压力下任何一种大都市组织都难以胜任整合区域事务的使命,为了治理大都市区的各种问题,欧洲组成了欧洲城市联盟和欧洲大都市网络两个重要的城际

联盟组织,这两个联盟加强了大都市在技术、知识、资本、信息等方面的互通与合作,两大城市联盟的成立为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提供了社会支撑,同时欧洲高等教育的区域融合有助于欧洲各大学在治理大都市区问题中发挥社会服务职能,推动大都市区城市问题的治理进程,从而推动欧洲各国走向深度融合。概而言之,大学与城市互动呈现“大学联盟与城市联盟互动发展”的色彩,即互动发展的集群化、联盟化。

六、结语

纵观大学与城市互动发展演变的历史,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发展中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既有被动适应又有主动顺应,既有国内互动也有国际互动,无论是何种形式、何种目的抑或是何种范围的互动,其结果都是推动大学与城市向前发展。同时,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并非仅仅是大学与城市的相互作用,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推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贺国庆.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9.
- [2]李泉鹰.从大学称谓变化看高等教育属性嬗变[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99—102.
- [3][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6.
- [4]周伟忠.冲突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6.
- [5][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M].王珺,刘晓峰,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1:215.
- [6]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历史描述与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97.
- [7]赵煦.英国早期城市化研究——从 18 世纪末后期到 19 世纪中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42.
- [8]李立国.工业化时期英国教育变迁的历史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36—238.
- [9]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51.